

更加想念恩师吴贻弓…… 上海国际电影节又来了，

■ 文江平

夏日的上海，处处都是电影节的气息。作为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办公室主任，年年这时候我都会收到现今电影节组委会发来的邀请函。

一晃三十多年匆匆而过。常有朋友客气地说，你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办者之一呀！我每次听了都赶紧摆手，万万不敢领这份名头。我当年才三十出头，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不久，不过是跟在吴贻弓先生身后打杂跑腿、跟班学徒的青年导演。真正白手起家、拓荒铺路，一步步把电影节立起来的，是我的恩师吴贻弓，还有那一代踏踏实实做事、清清白白做人的老电影人。

前几日，读了原上影集团副总裁、老同事许朋乐兄长的回忆文章，写的全是第一届电影节初创时的细碎往事，字里行间，满是对贻弓先生的敬重与感念。读着读着，20世纪90年代我们一群人一起吃苦、一起摸索、一起逐梦的日子，清清楚楚浮现在眼前。

1993年，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从零起步。那时候国内没有成熟的国际A类电影节，中国电影很少有和世界对话的渠道。上海是中国电影的根脉所在，沪上许多资深电影人心里，都揣着一桩念想：办一个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国际电影节。这也是时任上海电影局局长吴贻弓先生最大的期盼：我们要有自己的平台，让身处困境的中国电影走出去，也让世界各地的优秀电影走进来。

先生能扛起这份重任，从来不是偶然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他导演的《城南旧事》温润质朴、打动人心，早已扬名海外。后来影片远赴马尼拉国际电影节参赛，一举拿下大奖。现在的年轻影人大多不知道，那时候的马尼拉电影节，是全亚洲规模最大、规格最高的国际影展。东京国际电影节尚未创办，马尼拉就是亚洲电影走向世界的最高门户。那次获奖，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影坛扬眉吐气。领奖台上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亲自为吴贻弓导演颁奖，让世界真切看见了中国电影的底蕴。正因为先生有这般开阔的国际眼界和扎实的艺术底气，由他牵头筹办上海国际电影节，谁都心服口服。

要把首届电影节办得专业规范、有模有样，上海市电影局党组决定，让吴贻弓先生以导演身份，远赴柏林电影节，“潜伏”实地“偷学”，取得“真经”。说起来不是当年条件寒酸，也不是刻意节俭，是那一代人天生就朴实，做事不图排场。先生往返全程都坐普通舱。如今回想，他那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，着实不易。以他当时的身份，官职比不少厅局级干部还要高，坐商务舱完全合情合理，可先生坚决不肯。他总说，能省一点是一点，省下一张机票钱，往后

就能多请来一位国际贵宾。

回国前，他把所有细碎的资料——整理装箱，画册、会刊、每日新闻、入场券、火车票、工作吊牌、场地总图，乃至印有电影节图案的纸杯、信封，一样不落。师母张文蓉交给他的任务——买一只德国炒菜锅，先生没能完成任务。不是忘了，是行李太多，拿不动，怕超重。回到上海，永福路52号的办公室里，资料堆得满满当当，像个杂货铺。我们当时就靠着这些“人肉”背回来的“宝贝”，对照着欧洲三大电影节的成熟模式，依葫芦画瓢，按图索骥，一步步搭建起我们自己的赛事框架和运营体系。但先生一再叮嘱：可以借鉴，绝不照搬。学别人的优点，一定要守住我们自己的民族气质、上海本土的味道。正是这份清醒和坚守，让上海国际电影节从起步开始，就根基稳固、气质独特，也为日后跻身国际A类顶级电影节，埋下了扎实的伏笔。

如今大家熟知的上海影城、银星假日酒店，并非普通配套建筑，是当年吴贻弓先生和伙伴们共同策划、统筹，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陈清泉亲自监工，专门为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打造的一流电影官，完全对标国际标准，专为这场光影盛会而生。崭新的场馆、规整的布局，不仅让当年的筹备工作顺畅有序，也让远道而来的各国影人，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实力。

从前办节，没有热闹排场，没有多余应酬，从头到尾，只有对电影的挚爱。贻弓先生做事极为细致，大事小事都亲自跟进、亲自把关。赛事规则、评委人选、交易市场规划，他逐一敲定；每位嘉宾的出行路线、饮食喜好、游览行程，他逐一过问。

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嘉宾，大半个中国的电影圈都来了。都是吴贻弓先生一笔一划亲自写的邀请书。张艺谋、巩俐他们正在山东农村拍电影《活着》，交通不便，没有便捷航班，几个人星夜兼程，坐着绿皮火车“咣当咣当”颠簸十几个小时，匆匆赶到黄浦江边赴会，颁完了奖，妆都没来得及卸，又乘原火车返回外地。

电影节群星云集的日子里，我们陪着索菲亚·罗兰去弄堂口吃生煎馒头和鸭血粉丝汤，带着奥利弗·斯通夜游外滩。《音乐之声》的导演罗伯特·怀斯，年少时曾受上海同窗招待，吃过华人餐厅的鲜肉小馄饨，这份味道他记了一辈子。那次我们特意安排，让他重温了久违的滋味。梁家辉夫妇等许多香港影人山城陞陆，我们便在绿波廊备好特色上海小吃招待。不过我们那个有着“小开”别称的副局长张元民专门嘱咐，吃啥都行，“银子”必须由他来付，不开发票，不报销。

也正是这份纯粹干净的办节风气，让来自法国的国际制片人协会秘书长别雷松先生格外赞赏。他从前听说，中国国内不少会议活动，都是大桌设宴、应酬繁多，可他所见的上海国际电影节，全然是另一番模样。各色影人手里捧着汉堡、拿着可乐，步履匆匆，穿梭在各个放映厅看片交流，往返于各个展位调研对接、洽谈合作。别雷松直言，这才是电影节应该有的样子。

首届电影节最有远见的一步，便是早早搭建起专业成熟的电影交易市场，将影片展映、作品评奖、产业交易融为一体，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，这也是后来上海国际电影节成功获评A类顶级电影节的核心底气。那几天里，电影节市场负责人、后任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的杨玉冰，天天笑迎五洲宾朋，忙得四脚朝天，但也着实开心。

时隔多年，首届电影节的评价阵容，我依旧记得清清楚楚。评委会主席由谢晋先生担任，七位评委分别是：中国导演谢晋、美国导演奥利弗·斯通、日本导演大岛渚、中国香港导演徐克、澳大利亚导演保罗·考克斯、俄罗斯导演卡伦·沙赫纳扎洛夫、巴西导演赫克托·巴本科。各路国际影坛大家齐聚浦江之畔，让我们首届电影节的起点，直接站上亚洲前沿。

筹备之初，大家都晓得每一分钱要用在刀刃上。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影城地下食堂吃饭，每人每天餐补仅有一块钱。没人叫苦，没人计较得失，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拼尽全力，办好这一场属于中国的国际电影节。偶尔想要改善伙食，要么去影城三楼吃一碗

热乎浇头面，要么到对面小花三块钱吃一碗牛肉拉面，弄个一肚子水饱，擦干净嘴，立刻回头干活。

恰恰是这些朴素平淡的日常，最能照见那一代影人的崇高风骨。吴贻弓先生每次在影城食堂吃面条或蛋炒饭，都会悄悄在碗底压上十元的“大团结”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每每想起这个画面，我心里又是温暖，又是愧疚。我常常想，若是先生还在，我会再陪他去上海影城吃一碗阳春面，也悄悄在碗底放上十块钱，让我这个徒弟，也为师父尽一次孝心。

当年和贻弓先生搭档共事的同仁，也都正派真诚，是好官又是好人。上海电影局党委书记马林发，是国内知名摄影家，《红日》《白求恩大夫》《追鱼》这些经典影片，都出自他的镜头。时任副局长张元民，师从摄影泰斗吴蔚云先生，《于无声处》《闪光的彩球》《滴水观音》等诸多佳作，都是他的心血之作。二位领导从来不要架子，见了人永远都笑嘻嘻的，说话都没个高声，一辈子默默奉献。我们晚辈从不拘谨地称呼他们“书记”“局长”，平日里张口闭口都是“老马”“老张”，格外亲近。谁要是工作饿了，随时能去张元民老师的办公室，他桌上常年摆着糖盒、饼干桶，任由我们当作“自助餐”。

每逢6月电影节启幕，我格外思念的，还有电影节最初的重要策划者张瑞芳老师。6月15日是她的生日，这个日子，我多年从没记错，从没淡忘。从前每到这天，我们都会备好蛋糕，捧上鲜花，上门为她祝寿。早些年，还能去她的寓所闲话家常。后来瑞芳老师身体抱恙，常年在华东医院休养，我们便年年准时前去探望。哪怕卧病在床，她心里最牵挂的，依旧是上海国际电影节。每次见我，总要细细询问当年影展的近况：今年有什么好片子？北影的于蓝、于洋来了吗？八一厂的田华到了没有？还有长影的浦浦，当年我们一起拍过《松花江上》……句句闲谈，皆是对电影最赤诚的眷恋。

后来，瑞芳老师走了，但我心底的牵挂，半分未减。每年这时，只要我人在上海，总会独自站在华东医院门口，静静朝朝里眺望。我总觉得瑞芳老师还在。

6月的上海，时常飘着蒙蒙细雨。闲暇时分，我喜欢慢慢独行，哪怕淋着也不愿撑伞。走过武康大楼、江宁大楼，走过上影公寓、吴兴公寓，走过大木桥、徐家汇，走过复兴路、华山路的一栋栋老洋房。这一带，藏着无数上海老艺术家的故居。汤晓丹、白杨、赵丹、孙道临、谢晋、徐桑楚、刘琼、秦怡、舒适、乔奇、仲星火、顾也鲁、黄淮、白穆、张伐、李纬、黄蜀芹……这些德艺双馨、我毕生敬重的老艺术家，都曾在这里生活耕耘、朝夕度日。望着熟悉的老街老楼，听着清风吹过层层绿荫的轻响，扑面而来的，全是旧日时光的味道。

我心里一直藏着一点小小的遗憾。当年陪着索菲亚·罗兰吃生煎馒头之余，还带她去淮海路的哈尔滨食品厂，挑选了蝴蝶酥、萨琪玛等海上食品，装了满满一大箱，她说要带回意大利。一心忙着招待远方的贵客，却忘了多买一些，抽空也约咱上影的“老小孩儿”们坐一坐，喝个下午茶，喝喝咖啡、吃吃小点心，讲讲老故事、讲讲老八卦。

我少年入行，这半辈子，始终小心翼翼地踏着先贤的足迹前行。我始终记得，是这一代老艺术家，撑起了上海电影的璀璨荣光，稳稳托举起上海国际电影节，让它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。如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，扎根亚洲、享誉全球，稳居世界A类顶级电影节之列，佳作荟萃、高朋云集、观者如潮。这股光景，不正是贻弓先生当年日夜期盼的模样吗？

繁华越盛，思念越深。我伫立在上影集团大院门前，感慨万千：今日所有的荣光与辉煌，都是咱们厂里的几代人用心用情用生命拼搏奋斗而换来的哟！

又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启幕，新华路上的梧桐枝叶温柔舒展。此时此刻，我满心感恩恩师吴贻弓，深深怀念老一辈真诚纯粹、深耕光影的电影人。岁月绵长，我会永远铭记师父吴贻弓先生生命最后日子里的那句话：电影万岁！

（作者为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会长、中影集团一级导演）

“侨批”——水木的年华

■ 文慎远

最近热映的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在影片的最后留给了观众一段震撼人心的文字：

鸦片战争后，下南洋的中国侨民，持续往家乡寄侨批，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外汇来源。

1864—1980年，华侨汇款累计约308亿美元；抗日时期，南洋华侨汇款购买飞机、药品、军粮等物资，支援救国；经济困难时期，每年上亿的侨汇，造桥、修路、建学校，为国家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至20世纪80年代，批局退出历史前，全国总计收到超3000万封侨批；2013年，侨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世界记忆名录”，被誉为“侨史敦煌”。

“侨批”，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，是一个陌生的词汇。没有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我们后辈或许一辈子都不会留意“侨批”这个词，更不会花心思去探究其背后深藏着的无数个“江海有岸，团圆可盼”的感人故事。

专攻涉侨经济、侨务政策的华侨大学教授张赛群曾指出：“侨汇是国家外汇的稳定来源。中国有大量海外侨民，他们汇回的款项积少成多，形成数目可观的侨汇，在特定时期有效地弥补了国家外汇的不足。据粗略统计，1950年至1988年中国侨汇收入共96.1亿美元，同期外贸赤字61.24亿美元。可见，侨汇对于弥补外贸赤字和平衡国际收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其背后是对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。”她认为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，侨汇占中国外汇的比重开始下降，但侨汇的重要性不可忽视。相比其他外汇，侨汇作为海外侨胞寄回家乡亲友的款项，不易受国际金融和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，一直以来比较稳定。

这是从国家建设、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宏大历史叙事中看待“侨批”、评价“侨批”，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则是以一个半虚构的故事来解读“侨批”、亲近“侨批”。依笔者拙见，“侨批”具有经济性、社会性、人文性等多重属性，这多重属性黏合在一起，能够传递出的是中华文化的某种特质。这种特质是沉淀了五千年文明史并深深根植于中国人（或者说华人）血脉深处的，一个是“木”的特质，一个是“水”的特质。

“木”的特质：生命力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几位主要角色的名字都与木相关，郑木生、谢南枝、叶淑柔，而主角之间的“侨批”中唯一的信物便是“木棉花”。“木”作为五行之一，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生发，是生命力的体现。中国人下南洋，历经艰险，受尽苦难，但生命力异常顽强，只要有一点阳光、一滴雨露，便能扎根发芽，不断生长。哪怕遇到大风大浪，也不会浇灭“木”的生命力。电影中，郑木生等“唐山”人在暹罗是社会底层的打工仔，讨生活的日子过得很苦，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乐趣，也能找到自洽的状态。哪怕遇到外人欺负，甚至遭受房屋失火的“灭顶之灾”，也没有自暴自弃，依然选择向阳而生。即便是从小没有受过苦、受过罪的谢南枝，在“一夜返贫”后，也可以从洗碗工、洗衣女做起，直至支起小摊，做起无米糠的生意来。这些电影情节都是“木”特质的具象化表达。

同样的，“木”的生命力还体现在对改变命运的执着上。所谓十年树木、百年树人，“木”的特质也让郑木生这些番客们深知唯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，要尽最大努力让自己的下一代识汉字、学文化。影片中，木生曾与南枝就离开中文学堂的事情产生激烈争吵，木生留下的那句——你（南枝）不识字，可以靠收一辈子房租养活自己，而那些孩子不识字，就只能一辈子做牛做马。这直接道出了教育之于他们这些南洋打工人的无比重要性。最终南枝不仅没有反对开办中文学堂，反而自己也成了其中的大龄学员。而从影片之后的情节可知，南枝正是因为识字学字，从事了教育事业，才使得自己与儿子泽华的日子越过越好。同样的，那些受到资助与恩泽的孩子们，也懂得饮水思源，长大成才后积极支持教育事业，这才有了那么多所以“木生”为名的学校。以“木生”为名，明线上是对郑木生的感恩与纪念，暗线则是表达了教育与命运改变的内在逻辑，也就是“木”的特质。

实际上，了解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的人都知道，20世纪上半叶不少私立大

学的创办与发展都离不开侨汇，离不开远隔江海万里的侨胞们支持。例如，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17岁赴新加坡随父经商，后独立创业，开拓橡胶种植业，被称为“橡胶大王”。他于1913年在厦门先后创办了集美小学、集美中学、集美大学和厦门大学。厦门大学、集美学校各校师生都尊称其为“校主”。同时，他于1919—1947年的近30年里，在新加坡先后创办了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、水产航海学校、南侨师范学校、南侨女子中学等学校。陈嘉庚用一生对教育事业的无私贡献诠释了其名言：“国家之富强，全在乎国民。国民之发展，全在乎教育。”又例如，复旦大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院校，被誉为“复旦保姆”的功勋校长李登辉教授就是印尼华侨，他出任复旦校长后一直筹谋募集民间资金扩大办学规模，1918年1月重下南洋，赴印尼、新加坡等地演讲演说，向华侨募捐善款资助复旦校园建设，半年时间募得善款折合复旦15万元。李登辉校长用这15万银元日后购置了江湾70亩永久校基，开启了复旦办学发展的新征程。

“水”的特质：乡土情

除了“木”，“水”是贯穿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整部电影最为重要的意象。木生与淑柔第一次面对面说话就是在水边、在桥上，最终以木生落水，浑身湿透戏谑收场。木生与南枝的第一次碰面，是木生偷偷寄宿在南枝的租屋，从浴室冲凉出来与南枝尴尬相遇，此时的木生同样是浑身湿漉漉。木生的发家是因为在海上跑船，两年里赚到的钱比之前十年都多得多，可算得上是因水转运、因水生财；而最终木生还是在船上，因仗义相助他人，受歹人所害，落得个坠水身亡的结局。木生遇难后不久，淑柔来信说，七夕夜闻溪水潺潺，梦见木生归来，仍是少年模样。而南枝1978年寄出的那封能够解开谜团的侨批，也是在大雨倾盆与溪水疾流中与淑柔错过。

“水”的意象似乎冥冥之中代表着一种神秘力量，因缘际会，造化弄人。但“水”又何尝不是连着家乡的一条清溪、一眼井水、一串泪珠。所谓柔情似水，“水”的源头在家乡，亦在异乡人对乡土、对父母、对妻儿的思念中，这也暗合了影片中那最著名的那句台词——“江海万里，心中念你，便不觉遥远。”

“水”在中国文化的五行学说中有“润下”之意，也就是说河流具有滋润大地的性质。对中国人而言，被滋润的大地不是山川大河，而是每家每户门前的田、屋外的地、房后的山，是实实在在、具象化的乡土情。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依水而居、因水而兴的，有水便有望，有水便有归途。
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无数下南洋的“唐山”人终身挂念的就是自己的家乡，那成千上万的“侨批”，不都是走水路寄回了他们各自的家乡吗？正是这条跨越山海的水上邮路，将海外游子们的牵挂与血汗钱与他们魂牵梦萦的“唐山”紧紧连在了一起。水被装进不同的器物，便能形成不同的形态，但离开器物，水依然是水，物质不曾改变。人若水，一个人在社会上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，会经历不同的人生阶段，但无论何时何地，人的底层情感不会变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乡土情——那种对家乡的思念与眷恋之情。笔者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联想到“水”的物质纯一性与形态多样性，它历经千百年沉淀出中国文化的特质，而这样的特质与乡土之情始终紧紧绑在一起。正如唐人贺知章的著名诗句——离别家乡岁月多，归来人事半消磨。惟有门前鉴湖水，春风不减旧时波。

如果从时间维度看，“木”的生发成长，历经岁月的痕迹；如果从空间维度看，“水”的源远流长，连接起万里行途。时空交错，水木相融，写出了一封《给阿嬷的情书》。

“木”是质地坚硬的，但它也能生出柔软的“叶”；“水”是质地柔软的，但它却能汇聚起坚强无比的气势与能量。一木一水，一阴一阳，融合在一起，便能融出一个“茶”，独属于中国人的“茶”。难怪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主题曲定名《月下煮茶》，歌词唱道：

身在何处少年家？繁花到底落谁家？我愿今夜为你先煮一杯茶，一杯又一杯。身在何处少年家？繁花到底落谁家？我愿今生为你先煮一杯茶，一杯又一杯。